

第五章 合浦南越国墓的考古学研究（下）

本章通过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首先扼要地概括合浦南越国墓葬的区域特征，其次从横向讨论合浦南越国墓葬与岭南其他地区及西南、两湖、吴越和越南北部等地区的文化交流，最后从纵向考察合浦南越国墓葬与当地汉墓的文化关系。

一、区域特征及其与周邻地区的文化关系

（一）区域特征

由于土墩墓仅发现一处，因此以文昌塔墓地第一期墓葬为分析对象。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来看，该期墓葬具有较明显的区域特征。文昌塔这批墓葬形制简单、规模较小，窄土坑墓共 34 座，占同期墓葬的 53%，其中 9 座墓室四周或两侧有二层台，仅 1 座带墓道；其余 30 座宽坑墓，墓底多见横向枕木沟。由于报告中未使用“木椁墓”这一概念，加之发掘年代已久，报告中许多墓葬信息缺失，现场照片未发表，难以准确判定，但不排除有木椁墓的可能。在广西汉墓较集中的平乐、梧州、贵港等地，西汉早期墓葬发现数量较多，形制较多样，同合浦同期墓葬有明显差异。

20 世纪 70 年代，桂北地区平乐银山岭发现 165 座墓葬，其中战国墓 110 座^[1]，汉墓 45 座^[2]。对于这批“战国墓”的年代学者颇有争议，认为其年代判定过早。近年来，有学者对这批墓葬年代进行了专门研究，郑君雷依据墓葬形制和随葬陶器、铜器及铁器，将这批战国墓分为二期 5 段，其中第二期属南越国时期^[3]（参见附录《平乐银山岭墓地的年代学问题》）；熊昭明等人重新梳理这批墓葬的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对其出土的陶器皿及铁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并参考其他器类及墓葬形制、葬俗等，判断其均属南越国时期即西汉早期墓^[4]。无疑，这批“战国墓”至少有大部分应属南越国时期。与平乐银山岭早期墓葬相比，合浦同期墓葬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如平乐银山岭墓葬形制虽然也有长方形窄坑墓、长方形宽坑墓和带斜坡墓道的木椁墓，但是窄坑墓数量略多，墓底部铺卵石、置腰坑、二层台的现象较普遍，而合浦文昌塔第一期墓葬不见墓底设腰坑和铺卵石的现象；从出土器物和组合看，平乐银山岭墓地除陶器外，随葬铜器和铁器数量较多，而合浦文昌塔墓地的随葬品 80% 为陶器，仅见少量铜器和铁器；文昌塔第一期墓葬出土器物较少，器类简单、以罐为主，仅有少量墓葬见仿铜陶礼器鼎、壶，而银山岭墓地陶器种类以杯为主。

桂东地区汉墓密集区为梧州、贺州及周边市县，墓葬规模较大，等级较高，西汉早期土坑墓和木椁墓较为常见。如 1976 年贺县河东高寨（今贺州）发掘的 5 座西汉早期墓葬^[5]，均为木椁墓，个别墓道有石膏泥填护，有无墓道、斜坡墓道、阶梯式墓道三类；随葬器物类型较丰富，中原地区常见的鼎、盒、壶、仿铜陶礼器组合形式较普

遍，铜镜、玉器、珠饰品等器类丰富。2010年贺州钟山县发掘的12座西汉早期墓^[6]，形制较合浦文昌塔一期墓葬不同，该批墓葬墓室两侧普遍设置柱洞，个别有腰坑或放置砾石。随葬器物为碗、纺轮、小釜、铁环首刀和玉环。而同期合浦墓葬中仿铜陶礼器组合出现不完备，且数量较少，多为鼎、壶单个出土，或偶见组合出土，常见瓮、罐、甑、三足盒等器物组合。

以贵港为汉墓分布集中区的桂东南地区，西汉早期有竖穴土坑墓和木椁墓两类，部分无墓道。1976年发掘的罗泊湾一号墓^[7]，为带斜坡墓道竖穴木椁墓，南侧有车马坑，椁室之下有殉葬坑和器物坑。部分墓葬发现外藏椁，如1980年发掘的贵县风流岭M31，墓道一侧带车马坑^[8]，而外藏椁形制在合浦始见于西汉晚期。随葬器物类型较合浦丰富，漆木器、铜器、铁器、玉石器等在大中型墓葬中常见。这些大中型的墓葬不见于合浦，合浦发现的均为小型墓葬。

作为南越国政治中心的广州，20世纪50-60年代发掘有182座西汉早期墓葬^[9]，其中无墓道的窄坑墓数量较少，部分墓底有腰坑或铺石；以竖穴木椁墓和带墓道竖穴分室木椁墓为主，带斜坡墓道的墓葬已较普遍。随葬器类丰富，既有甑、双耳罐、盒、三足盒等本地特色陶器，亦有体现汉文化的鼎、盒、壶、钫、熏炉等器物，出现井、灶等明器模型。井、灶等明器模型是在汉文化影响下出现的重要器物，但在合浦文昌塔一期墓葬中均未发现。

经和周边地区同期墓葬比较，可以看出，合浦西汉早期墓葬等级较低，墓葬规模较小，形制简单，随葬器物类型单一，以陶器为主，器型普遍较小；以各类罐为主，部分为软陶，制作粗糙、烧制温度不高；铜器次之，约占16%，为饮食器、兵器和日常生活用具；铁器、滑石器、玉器、串饰数量甚少。这与南越国时期各地发展程度不一有关，体现出合浦发展的滞后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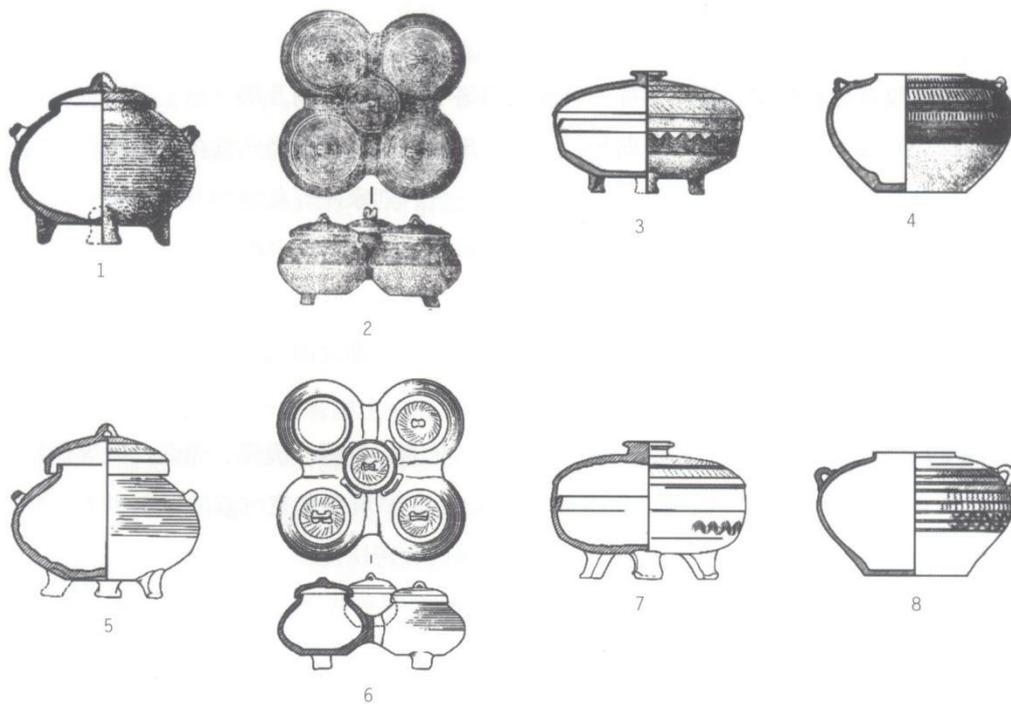
（二）与周邻文化的关系

中原地区汉墓数量较多，形制多样。合浦文昌塔一期墓葬形制及部分出土器物多可在中原地区的早些阶段找到原型。自西汉早期始，合浦出现的带斜坡墓道竖穴墓在中原商周时期已广泛使用，如殷墟地区历年发掘的小屯、后岗、大司空村、刘家庄等墓地均有发现带一条、两条或四条斜坡墓道的土坑木椁墓^[10]，到了周代该类墓葬在中原大型墓中更为普遍。合浦文昌塔一期墓葬出土的鼎、壶、削刀、铜镜、半两钱、纺轮等均能在中原墓葬出土的器物中找到原型。

此外，文昌塔一期墓地出土的部分器物还体现出西汉早期合浦与岭南及巴蜀地区、楚地等有密切的交流，显示出多元文化的交融。

合浦文昌塔一期随葬的瓮、罐、三足罐、盒、三足盒、联罐、提筒、匏壶、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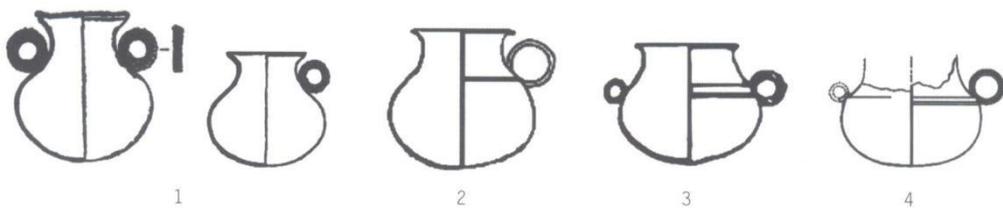
器物与广州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同类器物极为相近（图 5-1），窄坑墓和宽坑墓的形制也十分相近，体现出当时合浦与以番禺（今广州）为中心的南越地区有密切交往。



1、5.三足罐（广州汉墓M1068:4、文昌塔M63:7） 2、6.五联罐（广州汉墓M1095:2、文昌塔M35:2）
3、7. 三足盆（广州汉墓M1143:7、文昌塔M63:2） 4、8.甗（广州汉墓M1125:5、文昌塔M78:1）

图 5-1 广州与合浦出土的南越陶器对比图

合浦文昌塔 M83、M79 各出土 1 件铜釜，该类器物在春秋战国之际或稍早起源于蜀地的成都平原，从战国中晚期开始特别是秦灭巴蜀之后进入关中地区，逐渐为秦人吸收改造，后随着秦统一战争或迁募向各地扩散^[11]（图 5-2）。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湖南等地均有发现，应是源于此。从环耳的形制看，合浦出土的铜釜与陕西秦墓发现的同类器物相似，应是秦朝统一岭南时期传入的。



1. 四川新都战国墓^[12]（战国早、中期之际） 2. 陕西凤翔高庄 M1:8^[13]（战国晚期）
3. 陕西凤翔高庄 M33:1^[14]（秦统一时期） 4. 合浦文昌塔 M79:5（西汉早期）

图 5-2 各地出土的铜釜对比图

文昌塔一期墓葬还出土有滑石璧和滑石盘。滑石器最早在湖南长沙战国中期墓出现，西汉初期已盛行，在长沙还发现了滑石原料产地。广西北部虽有滑石矿，但当时可能并未开采，故推测应为湖南一带传入。文昌塔 M168 出土的陶球与战国至西汉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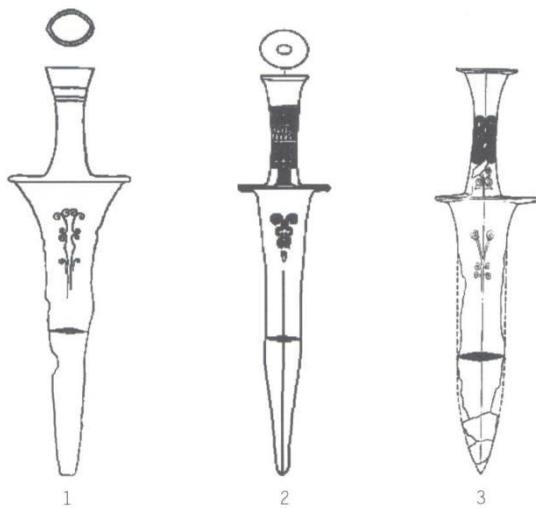
楚地和南越王墓发现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及陶土仿制的蜻蜓眼珠形制相近。赵德云通过研究指出楚地周围出土的这类“几何线间隔眼珠”，应是从楚地传入^[15]（图5-3）。此外，以长沙为中心的“南楚”是楚国玻璃制造的中心地带^[16]，合浦文昌塔一期发现的玻璃残片不排除也是自楚地传入。



1. 陶制（湖北江陵望山 M1/战国中期） 2. 玻璃制（长沙楚墓 M442:1/战国晚期）
3. 玻璃制（南越王墓） 4. 陶制（文昌塔 M168:16）

图5-3 楚地和岭南出土的蜻蜓眼式珠对比图

合浦文昌塔 M33 出土的一字格铜剑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在云南同期墓葬中多有出土，如江川李家山 M25 出土 1 件，年代为战国末至汉武帝以前^[17]；昆明羊甫头 M113 出土 1 件，年代为西汉初至公元前 109 年^[18]。该器物的出现，或反映出西汉早期滇文化地区和合浦已有交流（图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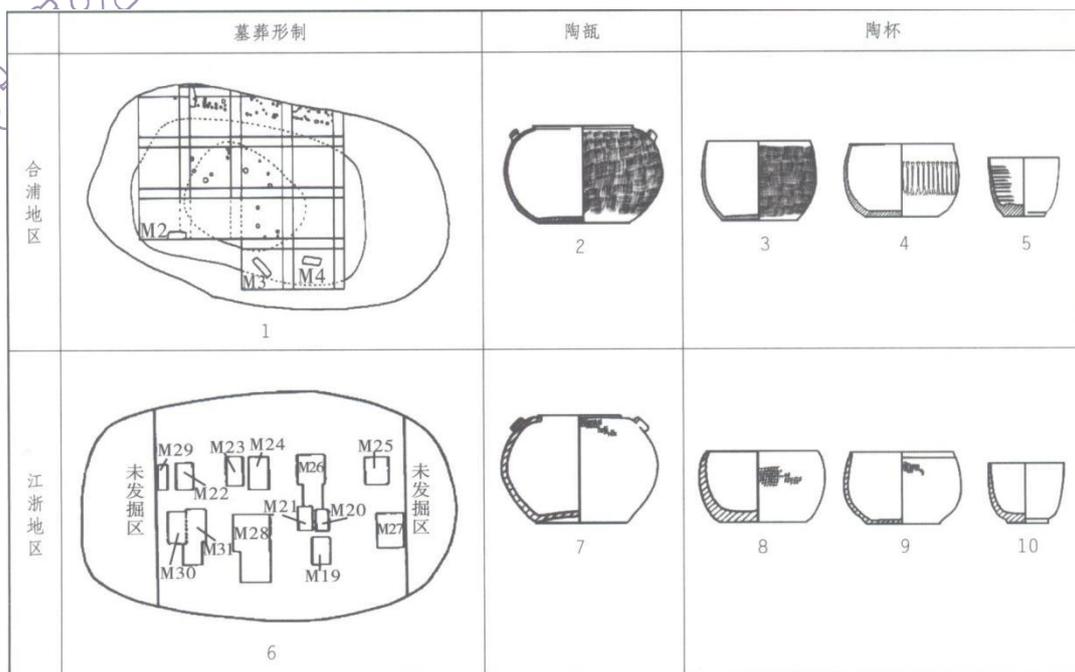


1. 江川李家山 M25:5 2. 昆明羊甫头 M113:358 3. 合浦文昌塔 M33:1

图5-4 云南与合浦出土的一字格青铜剑对比图

合浦双坟墩土墩墓的发现则表明，早期吴越地区和合浦已有交流。合浦双坟墩 D2 的一墩多墓形制及出土的陶甗、陶杯等均与江浙地区的土墩墓几乎完全相同（图5-5），这些陶甗和陶杯属硬陶，烧成温度高、釉层均匀，远超当地同期陶器的制作水平。报告推测墓主应为江浙越人后裔，因战乱或其他因素南迁至此^[19]。从合浦双坟墩 D2 看，江浙越人南迁至合浦之初，完全沿用土墩墓这一独特的墓葬形式，出土器物均为越式器；至略晚的西汉中期，D1 已随葬有岭南常见的几何印纹硬陶敞口瓮，这体现出与本地文化的融合。随着广西、福建、广州、越南等地土墩墓的相继发现，其迁徙的路线

也较为清晰，从浙江南部、福建进入岭南地区至越南北部^[20]。



1. 双坟墩 D2 2. 双坟墩 D2M2:1 3. 双坟墩 D2M3:1 4. 双坟墩 D2M4:1 5. 双坟墩 D2M4:3
6. 方家山第三号墩^[21] 7. 安吉垅坝 D12M2:42^[22] 8. 嘉兴出土^[23] 9. 安吉 D12M2:48 10. 戚家墩 M1:2^[24]

图 5-5 合浦与江浙土墩墓形制及出土器物对比图

此外，合浦南越国时期墓葬与越南东山文化关系也很紧密。合浦与越南北部临近，海陆相通，往来便捷，尤其是西汉中期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后，合浦更成为沟通东南亚地区和中原地区的重要通道。从越南北部现已发现的大量汉墓看，虽然自汉武帝设交趾郡的西汉中期开始，汉文化在该地区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是在南越国及先秦时期，越南北部仍以本地东山文化为主。东山文化是越南北部典型的土著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发现较多墓葬，有土坑墓、船棺葬、积石墓和瓮棺葬等，以土坑墓数量居多，主要分布在清化平原。从墓葬形制及出土的青铜器和陶器看，东山文化除与滇文化关系密切外，还与岭南越文化也存在一定的交流，部分长宽比达 4:1 左右的东山文化土坑墓，或与岭南窄长方形越人墓同属越文化；东山文化出土的部分几何印纹陶，如方格纹、菱形纹、席纹、叶脉纹、曲折纹、云雷纹等，与包括合浦在内的岭南地区所出类同；东山文化的基本器类为圈足器和圜底器，在岭南地区也是最典型的，两地的折沿釜、圜底罐、折肩罐等器型近似，表明两地在陶器制作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交流^[25]；合浦文昌塔 M168 出土的 A 型鼎、M154 出土的铜扁钟与越南海防市越溪 M2^[26] 出土的同类器物十分相似，显示出合浦和越南北部地区联系密切。

二、与合浦汉墓的文化关系

土墩墓在合浦仅发现一处，形制独特，但从广西发掘的汉墓来看，该形制一直沿用至西汉中期、晚期。D2 一侧的 D1 年代或晚至西汉中期，随葬有岭南地区常见的敞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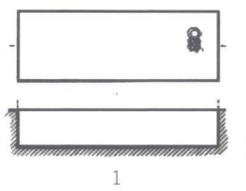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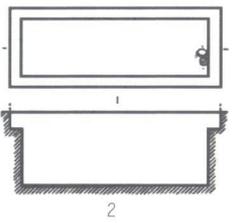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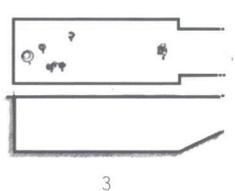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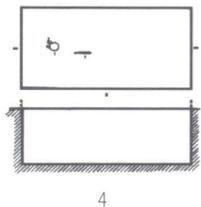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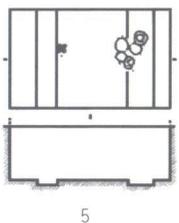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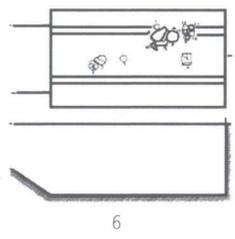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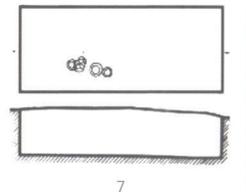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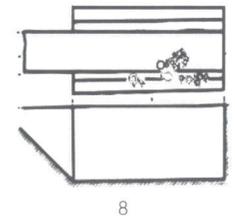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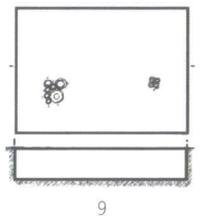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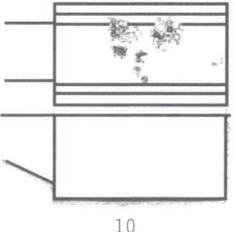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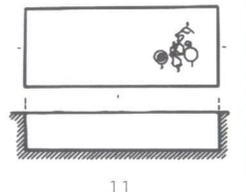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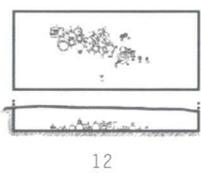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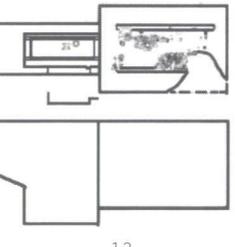
几何印纹硬陶瓮和汉式器；此外在广西桂平大塘城也发现有西汉晚期的土墩墓^[27]。这一形制丰富了西汉早期合浦墓葬类型，也为了解西汉合浦社会居民的多元构成提供了资料依据。

合浦文昌塔这批汉墓可分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和东汉早期、东汉晚期等五期。之前发掘报告中尚无发现西汉早期墓葬，西汉中期也仅风门岭 M27 一座。文昌塔第一期、第二期墓葬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合浦汉墓的内容，为研究合浦汉墓分期断代及相关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支撑。

合浦文昌塔一期墓葬出现的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为合浦汉墓的延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窄土坑墓沿用至西汉晚期，西汉中期数量减少，西汉晚期仅见个别；二层台形制自西汉中期不见，带墓道的窄坑墓自晚期多演变为宽坑。宽土坑墓在西汉中期继续沿用，二层台自西汉中期不见，带斜坡墓道的宽坑墓自西汉中期流行，西汉晚期成为合浦地区主要的墓葬形式（图 5-6）。

西汉早期合浦文昌塔墓葬出土器物主要为瓮罐组合、罐和其他陶器组合、仿铜陶礼器以及一些越式陶器，这奠定了合浦汉墓的随葬器物组合方式。其中瓮罐组合自西汉中期起较为普遍，流行至东汉时期；仿铜陶礼器自西汉中期开始鼎数量增多，并出现钫；出土的三足罐、盆、三足盆、甗、联罐、双耳罐等越式陶器，自西汉中期开始减少，三足罐和小盆自西汉中期不见（图 5-7）。出土的铜鼎、铜盆、铜勺、铜剑、铜戈、铜环首刀、铜矛、铜箭镞、铜带钩，铁剑、铁锛，玉璧、滑石璧等器类多沿用至东汉时期，为系统研究合浦汉墓器物组合及演变发展规律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仅供阅读

时期	窄坑墓			宽坑墓		
	竖穴直壁	二层台	带墓道	竖穴直壁	二层台	带墓道
西汉早期	 1	 2	 3	 4	 5	 6
西汉中期	 7		 8	 9		 10
西汉晚期	 11			 12		 13

1. 文昌塔 M35 2. 文昌塔 M38 3. 文昌塔 M92 4. 文昌塔 M50 5. 文昌塔 M16 6. 文昌塔 M011 7. 文昌塔 M191
8. 文昌塔 M14 9. 文昌塔 M010A 10. 文昌塔 M02 11. 文昌塔 M121 12. 文昌塔 M4 13. 风门岭 M26

图 5-6 合浦西汉时期墓葬形制

仅供阅读

时期	瓮、罐类陶器		仿铜陶礼器				越式陶器						
	瓮	罐	鼎	盒	壶	钫	双耳罐	三足罐	小盒	三足盒	联罐	甗	
西汉早期													
西汉中期													

图 5-7 合浦西汉早、中期主要陶器演变

仅供阅读 请勿侵权

-
- [1]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 [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 [3] 郑君雷:《平乐银山岭墓地的年代学问题》,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新果集(二)——庆祝林沅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第353-369页。
- [4] 熊昭明、李世佳:《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墓”的年代》,《江汉考古》待刊。
- [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贺县文化局:《广西贺县河东高寨西汉墓》,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第29-45页。
- [6]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钟山县文物管理所:《钟山铜盆汉墓》,科学出版社,2018,第38-54页。
- [7]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
- [8]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风流岭三十一号西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 [9]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第23-183页。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第100-138页。
- [11] 陈文领博:《铜鞮研究》,《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1期。
- [12]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 [13] 雍城考古工作队:《凤翔县高庄战国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9期。
- [14] 雍城考古工作队:《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 [15] 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考古学报》2012年第2期。
- [16]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第155-156页。
- [17]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 [18]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昆明羊甫头墓地》,科学出版社,2005,第169页。
- [19] 富霞:《广西合浦汉墓主人族属及域外文化因素探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4期。
- [20] 富霞、熊昭明:《从广西发现的土墩墓看越人南迁》,《考古》2016年第8期。
- [2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湖州市方家山三号墩汉墓》,《考古》2002年第1期。
- [22] 浙江省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垅坝D12土墩墓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3年第3期。
- [23] 陆耀华:《嘉兴印纹陶遗址与土墩墓》,《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 [24]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金山县戚家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1期。
- [25] 彭长林:《越南早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393页;韦伟燕:《越南境内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 [26] 韦伟燕:《东山文化与越文化的关系——以越南海防市越溪二号墓的研究为中心》,《学术探索》2015年第11期。
- [27]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桂平市博物馆:《桂平大塘城遗址汉墓发掘报告》,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西考古文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0,第213-254页。